

## 锐观察

## 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亟须高度重视

王海媚

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助长了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新的“伤害和歧视”,也即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已形成相当规模并对妇女和女童带来严重侵害,世界各国应该对这些行为进行道德反思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治。

## 先进技术给女性带来新的安全风险

古特雷斯对此给出明确定义,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是指“使用通信技术或其他数字工具实施、协助、加重或放大对某人造成伤害或不成比例影响的任何行为。”

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类型非常多,具体包括网络人口贩卖与性犯罪、数字空间针对女童的性剥削和性虐待、网络跟踪、网络骚扰、网络欺凌、隔空猥亵、非法数字监控、非法入侵女性社交媒体账号或个人电脑、窃取和传播(威胁传播)女性个人信息和私密影音资料、恶意篡改女性图像和散布谣言,发布关于女性的虚假错误信息和仇视言论,等等。

其中,一部分暴力侵害行为原本就存在,被先进技术赋予一些新的特征,比如网络人口贩卖和性犯罪等;还有一部分是数字技术催生的新的暴力侵害行为,比如网络跟踪和隔空猥亵等。总的来说,数字技术使这些暴力行为变得更隐蔽、更难追究,并且受害者数量更多、年龄更小,韩国的“N号房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

尽管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已对女性和性少数等其他弱势群体造成严重伤害,但是目前,世界各国对这些行为的关注和防治力度远远不够。现有数据表明,“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规模很大,其后有罪不罚的现象仍然很严重”。

目前,各国政府没有对该问题给予足够重视,缺乏关于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的普遍程度、形式和影响效果的全面且准确

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类型非常多,有网络跟踪、隔空猥亵、非法数字监控、非法入侵女性社交媒体账号等。技术助长了基于性别的暴力,使这些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和复杂化。尽管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已对女性和性少数等其他弱势群体造成严重伤害,但是目前,各国缺乏关于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的普遍程度、形式和影响效果的全面且准确的统计数据,现有数据大部分来自研究组织、民间社会或联合国开展的研究,因而,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难以对防治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进行有效宣传与倡导,缺乏对此类暴力行为的系统性分析,无法形成强有力的政策反应。

的统计数据,现有数据大部分来自研究组织、民间社会或联合国开展的研究,整体处于零散和不完整的状态。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难以对防治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进行有效宣传与倡导,缺乏对此类暴力行为的系统性分析,因而无法形成强有力的政策反应。

照片墙(Instagram)等都曾出现过网络性交易的信息。在此影响下,网络人口贩运的规模大幅扩大且更难被追踪。

女性还成为网络跟踪和网络骚扰的目标。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犯罪学和司法研究副教授罗伯特·德奥维迪奥等学者曾对1996年1月至2000年8月纽约警察局计算机调查和技术部门调查的201起严重网络骚扰案件进行统计,数据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为受害者,在这些案件中女性受害者比例为52%,而男性更容易成为施暴者,上述案例中男性犯罪者比例高达80%。

2019年,美国学者埃里卡·菲塞尔和布拉德福德·雷恩同样用数据证明了女性更容易遭受网络跟踪侵害,在他们采访的477位受害者中女性为331位,男性为115位,女性受害者数量约为男性的3倍。

尽管网络跟踪的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仍然是严重的,甚至远远超出最初的受害范围,“约3/4的受害者表示经历了网络跟踪犯罪的负面影响,其中61%受害者的健康状况受到损害,51%的受害者认为自己受到社会性伤害。”这些伤害还将对受害者的人生持续产生影响。

此外,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研究表明,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具有明显的交叉性特征,一方面,性少数人群受到骚扰的风险更大;另一方面,作为公众人物的妇女遭受骚扰的程度远远高于男性,比如女性政治人

物、法官和记者等。

## 消除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势在必行

技术助长了基于性别的暴力,使这些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和复杂化。因此,亟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此类暴力行为,比如,教授数字公民知识以便负责任地获取和使用技术,加强相关领域政策一致性和执法协调,以及加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问责等。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7届会议通过的《商定结论》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多项具体建议,为消除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提供了有益参考:

第一,加强问责制,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呼吁各国政府针对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制定和修订立法,出台配套政策并保障其实施力度,打击利用数字工具对妇女和女童进行骚扰、发表仇恨言论和贩运人口等暴力行为。加强针对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的数据统计,设立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受害者上报受害经历的渠道。

第二,制定性别和年龄敏感的数字安全战略,保护女性,特别是女童在数字空间的安全。预防和打击任何窃取和传播女性个人信息和私密影音资料、发生在数字空间中针对女童的性剥削和性虐待等行为,阻止施暴者对受害者采取线下伤害。在家庭、社区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建立联动保护机制,以便及早发现暴力行为并及时进行干预。

第三,为暴力受害者提供保护和社会服务。向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社会支持、保健、医疗护理、法律咨询和求助热线等服务,提高女性对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确保受害者能够平等诉诸司法,对由于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难以获得法律服务的受害者提供援助,为此类暴力事件提供更具保密性的报告机制,避免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博士)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许多人一生中都会受到不孕不育症的影响。大约17.5%的成年人(全球约六分之一人口)患有不孕不育症,让更多有需要的人获得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生育保健服务,成为迫切的需要。

报告最新估算数值显示,不同区域之间不孕不育症患病率的差异有限。同样,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患病率也相当,这表明这是世界各地所有国家的一项重大公共卫生挑战。

不孕不育症是男性或女性生殖系统疾病,指一年以上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而没有成功妊娠。该病症会造成巨大的痛苦、耻辱和经济困难,影响人们的精神和社会心理健康。

尽管问题严重,但预防、诊断和治疗不孕不育症的解决方案,包括体外受精等辅助生殖技术,仍然资金不足,而且由于费用高昂、社会污名和供应有限等因素,许多人无法获得。

目前,在大多数国家,生育治疗以自费为主,这往往会导致毁灭性的经济开支。与富裕国家的人相比,最贫穷国家的人在生育保健方面花费的收入比例更大。这种巨额支出往往阻碍人们获得不孕不育症治疗,或者可能使其直接因寻求治疗而陷入贫困。

世卫组织性和生殖卫生与研究司(其中包括联合国人类生殖研究、发展和研究培训特别规划)司长帕斯卡尔·拉蒂博士说:“加强政策和公共资金可以显著改善获得治疗的机会,并保护较贫困的家庭不会因此陷入贫困。”

虽然新报告显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全球不孕不育症患病率很高,但也强调许多国家和一些地区持续缺乏数据。报告呼吁提供更多按年龄和原因分列的不孕不育症国家数据,以帮助量化不孕不育症,并了解谁需要生育保健以及如何降低风险。

据了解,这份报告分析了1990年至2021年的所有相关研究。

## 世卫组织报告:全球每六人中就有一人受不孕不育症影响

## 新看点

## 法媒:泰国前总理他信女儿将参与竞选总理

葛雷雷



据法新社报道,泰国主要反对党为泰党证实,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的女儿将作为该党候选人之一,在泰国即将举行的选举中竞选总理。

报道称,36岁的贝东丹·西那瓦在社交媒体上拥有100万粉丝。尽管贝东丹怀有八个月身孕,但一直在积极开展竞选活动。她说,她从这场较量中获得了乐趣。当天,大批为泰党支持者身穿该党标志性的红色T恤衫,走进曼谷北部边缘地区的一个足球场,见证贝东丹与商人社他·他威信和该党战略师猜格森·尼蒂西里接受提名。

贝东丹对记者说:“这将是一个挑战,但我们会尽可能多地去沟通。”

据报道,泰国选举委员会3月21日公布,新一届国会下议院选举将于5月14日举行。选举委员会表示,各政党须在4月4日至7日之间提交其总理候选人选。(来源:参考消息网)

## 匈牙利人口持续下降到2050年或减少40万

据新闻网站“匈牙利每日新闻”5日报道,根据欧盟统计局最新的人口预测,到2050年匈牙利人口或减少40万,到2100年将进一步减少60万。

报道称,匈牙利的人口自1981年以来一直在下降。根据匈牙利中央统计局(KSH)的数据显示,该国人口自1981年以来估计减少73.7万人。

但媒体同时分析指出,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匈牙利的人口下降并不是该地区最严重的,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人口或在未来几十年下降23%。

截至2021年,匈牙利65岁及以上人口共197.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0.3%。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当一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则该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来源:中新网)

## 美马里兰州158名天主教神父虐待600多名儿童

韩超/编译

据西班牙《先锋报》网站报道,美国马里兰州总检察长、民主党人安东尼·布朗的一份调查报告称,158名天主教神职人员(神父、修士、宗教学校教师)几十年来虐待了至少600名儿童。

报道称,5日公布的这份长达456页的报告做出了上述陈述。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罗伯特·泰勒法官允许发布该文件的编辑版本(相关人员的姓名被划掉),并称“披露的需要超过了保密的需要”。

起诉文件中写道:“从1940年到2022年,巴尔的摩大主教管区100多名牧师和其他成员涉嫌对他们社区中最脆弱的未成年人进行了可怕和反复的虐待,而宗教领袖却视而不见。”文件还称:“天主教会的成员一次又一次拒绝考虑虐待的指控,并尽可能长时间地掩盖这些指控。”

据报道,该调查始于2018年,布朗称有300多人联系了他的办公室。

“贯穿整个调查的一件事是,这些施暴的牧师和宗教领袖对受害者、他们的家人和社区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布朗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来源:参考消息网)

## 图特写

## 中国白衣天使,传递中非友谊的使者



新华社记者

1963年4月6日,一支中国医疗队从北京出发,辗转10天,经莫斯科、贝尔格莱德、拉巴特,最终抵达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的赛伊达市。这是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派遣的第一支医疗队。

60年间,一代又一代中国白衣天使奔赴非洲,用智慧、汗水甚至生命,谱写一个个大爱无疆的动人故事,架起中非友谊桥梁。

## 奉献:在最艰苦和最需要的地方救死扶伤

阿尔及利亚小城赛伊达,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被称为“沙漠之门”。据第27批中国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赛伊达分队队长雷利荣介绍,每当沙尘暴来袭,就算门窗紧闭,沙尘暴过后“屋里沙尘都有几毫米厚”。因日照极强,气候干旱,当地蔬菜种类非常有限。

“当时,除了中国援阿医疗队队员,当地只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1965年到赛伊达参加援外医疗队的86岁湖北医生薛进回忆说。

现年60岁的骨科主任医师涂大椿来自湖北省荆州市肿瘤医院。2002年至今,他先后参加6批援阿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累计工作12年。

在中国援突尼斯医疗队西迪布宰德分队所在的驻地医院,彭夕华是唯一的麻醉师。她一人得干至少三人的工作,每周工作时长超过72小时,在骨科、手术室和妇产科三个科室手术区来回奔走。最

▲1963年4月,首批中国医疗队员抵达阿尔及利亚。那是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派遣的第一支医疗队。60年里,中国白衣天使在这里救死扶伤,用智慧与汗水写下感人肺腑的故事,也有很多故事中人物再相逢的感人瞬间。

2023年2月27日,在阿尔及利亚艾因迪夫拉,63岁的阿里里·赫依拉(左)到医院感谢中国援阿医疗队医生李洪玲。新华社发

▼2023年2月22日,中国援苏丹医疗队妇产科医生刘韡在苏丹阿布欧舍医院的病房为一名新生儿做检查。新华社发(中国援苏丹医疗队供图)



忙时,她一个上午接到37个有关手术的电话。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医生件民宪从2001年起,先后奔赴厄立特里亚、赞比亚、埃塞俄比亚援外,十多次感染疟疾。“医者没有国界。”件民宪说。

## 传承:责任、情怀和热爱

60年间,一代又一代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前赴后继,父子接力、夫妻共进、姐妹携手……将汗水挥洒在非洲大地上,有些队员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西安市红十字会超声一室主任武翊轮3次参加援苏丹医疗队,在那里工作6年。武翊轮和他的祖父、姐姐和姐夫,4人共11次,累计21年“接力”援外。

1980年,沈阿利出生时,祖父沈冬升正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医疗援助。为纪念、延续与阿尔及利亚的这段情缘,沈冬升给三个孙子分别取名“阿利”“小利”和“幼利”。2015年2月,沈阿利加入湖北省第24批援阿医疗队,追随祖父的足迹奔赴阿尔及利亚。

今年55岁的褚海林曾于2008年、2012年两次参加援助纳米比亚医疗队,2018年他再次主动请缨,作为第12批医疗队队长重返纳米比亚,妻子蔡小英也作为医疗队护士再次跟他走进非洲。

今年3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60年来,中国累计向非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7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3万人次,目前,中国援外医疗队在57个国家的115个医疗点工

作,其中近一半在偏远和艰苦地区。

## 造福:带不走的医疗队

2022年12月,作为中国援冈比亚医疗队队员,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心内科专家李阳为一名82岁的冈比亚患者成功实施了该国历史上首次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当地政府官员、媒体和民众纷纷为他点赞。

首例股骨头置换术、首例二尖瓣扩张分离术、首例断手再植术、首例脑外伤开颅术、首例角膜移植手术……60年间,中国医疗队在非洲各国创造了当地医疗史上的许多“首例”。

中国医疗队还无私地向当地医生传授医术。在阿尔及利亚塞提夫妇幼医院采访时,记者看到,来自武汉的中国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塞提夫分队队长朱涛用英文向当地医生和医学院学生讲授手术步骤,并在讲座后安排模拟操作。

60年来,中国援外医疗队通过临床带教、手术演示、学术交流、健康讲座、防疫宣教、远程指导等多种方式,与多个非洲国家医院建立了对口合作关系,支持非洲国家建立重点专科中心,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极大提高了受援国医疗技术水平,在非洲国家留下了“带不走的医疗队”。

## 友谊:凝结中非牢不可破的友谊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60年来,中国援外医疗队累计诊治患者2.9亿人次,其中大多数患者在非洲。

在埃塞俄比亚季马市郊外一个小山村,苍松环绕着一块被打扫得十分干净的墓地。长眠在这里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首批援助埃塞俄比亚医疗队队长、心血管专家梅庚年。1975年8月,梅庚年在考察疫区时因公殉职。

泽乌迪曾是梅庚年的患者,也是他的朋友。梅庚年殉职后,泽乌迪捐出自家院子作墓地,泽乌迪去世后,女儿若娥多铭记父亲嘱托,继续为梅庚年守墓。“我会告诉周围的人这位中国医生的故事。”若娥多说。

60年来,中国援非医疗队许多队员荣获受援国颁发的国家级勋章:贝宁三级勋章、中非共和国复兴二级荣誉勋章、赤道几内亚银质国家独立勋章、喀麦隆国家一级骑士勋章、毛里塔尼亚骑士勋章……

一枚枚勋章记录了中国援非医疗队队员们的无私奉献,凝结着中非牢不可破的友谊。